

書 評

虞 雲 國*

黃寬重

《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362頁，ISBN 9789863502692

在《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以下簡稱《探索》）中，黃寬重先生自述，他之選擇以南宋作為學史的志業，除「寄現實於歷史世界」外，更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南宋「是塊尚待拼補的歷史地圖」，（頁241）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其新著《孫應時的學宦生涯——道學追隨者對南宋中期政局變動的因應》（以下簡稱《孫應時》），便是對南宋歷史拼圖的新嘗試。

除〈導言〉與〈結語〉兩章外，全書可分三部份。第一部份由〈奠基鄉里〉、〈學宦難兼〉、〈黨禁池魚〉與〈青史播芳〉四章組成，著者自稱為「第一主軸」，以縱向方式論述了傳主生平。第二部份由〈師承轉益〉與〈應變世變〉兩章組成，著者自稱為「第二主軸」，前者梳理了孫應時及其學友在不同學派間轉向競合與轉益多師的複雜關係，後者探蹟了傳主的主

2018年9月19日收稿，2019年1月15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教授。

Yu Yunguo, professor,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要學友在黨禁劇變中各自應對與迥別命運。倘若抽去這一主軸，全書便只是一部扁平化單線條的人物傳，正是這一橫向布局立體化多維度地展現了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全景與細節，既匠心獨運，更不可或缺。第三部分是兩個附錄，釐清了傳主《燭湖集》版本的異同優劣，考辨編制了〈孫應時生平與書文年表〉，為研究夯築了文獻學的堅實基礎。

《孫應時》的學術價值及其對宋史（尤其南宋史）研究的示範意義，約有如下數端：

一、研究法門的金針度人

在南宋史研究上，著者自我概括其獨具特色的學術旨趣，即「從邊緣人物與地方事務切入，從側面理解政治問題，進而討論社會性議題」；但無論何種切入，其研究路向「習於將歷史現象與政治問題連結思考，研究內容也因此帶有較強的政治觀察」，即立足於政治史；但他認為，政治史研究應該突破典章制度與政治事件等傳統模式，「以發掘具有新意與啟發性的政治史議題」。（《探索》頁 1、11、14、241）《孫應時》從邊緣人物切入，進而討論南宋中期更廣泛的社會性議題，一如既往地延續其既定的學術理路，也是他開拓新議題的嘗試。然而，作為傳記形式的學術著作，著者似「特別關注政治、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個人與群體的適應、出路與最後的命運」。（《探索》頁 10）

在史料取資上，著者與前輩不同之處，即「從文集入手，冀能以異於往昔的探討方式，了解更為豐富多樣的歷史圖像」。（《探索》頁 241）隨著士人群體的崛起，兼之印刷術的發展，在宋代，即便正史無傳的中低層士人官僚，不僅其生平事蹟有機會載入文集、筆記或方志，幸運有文集傳世者孫應時也絕非孤例，這就為研究邊緣底層的士人官僚，提供了文獻史料的現實可能性。

由於對南宋文集全局在胸，諳熟於心，著者不僅在《燭湖集》通行文淵閣本之外，注意到學術價值更高的靜遠軒藏本；而且在發現《四庫全書提要》謬評《燭湖集》之後，並不止步於糾正其評的史事舛誤，而是敏銳意識到：這一誤讀背後蘊含著對南宋中期歷史由來已久的某種偏見。正是

著者久蓄待發的問題意識，兼之對《燭湖集》的深入把握，兩者在撞擊中為研究催生了新思路與新議題：以傳主這樣的邊緣小人物來展現南宋中期的多變大歷史。由此可見，著者之將《孫應時》定為課題並撰為專著，絕非妙手偶得，而是在問題意識的驅導下，以全面細緻的文集閱讀為基礎的。

有鑑於南宋文集中書信比重明顯增加，著者尤其推重書信對人物研究的特殊價值：一是「書信所傳達的真實感情在一般史籍或個人傳記也難以窺見」；二是「這些面相呈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溫度，也就是根本的人性，並不是從資料庫所得到的數據、數量所能展現的」。(頁274)由於孫應時存世傳記的信息有限，其文集中的書信轉而構成了相當珍貴的一手文獻。著者別開生面地將書信作為基礎史料，首次嘗試將書信「與個人生命史有所連結，進行長期、多角度的考察」。(頁272)從文集入手，充分發掘集內書信的史料價值，這種路徑與方法，無疑是極具啟發性的。

二、個案選擇的獨具慧眼

人物傳記型著述屬於個案範疇，個案典型與否直接決定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當代傳記學雖仍確認名人傳記的合理性與必要性，但已自覺將傳主的範圍下移到普通人。著者以孫應時為傳主，最能反映其個案選擇的視野與史識。

經歷唐宋之際的社會變遷，中小型庶民家族成為新家族的主體。著者選擇孫應時為傳主，顯示其研究視野轉向更具普遍性的寒素小族。孫氏家族經三代努力由農業儒，轉型為鄉紳社會一份子。孫應時及其代表的由農轉儒的小型家族，在科舉社會與家族轉型中就極具典型意義。

科舉制促成了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宋代君主集權政體正是以士大夫官僚為其統治基礎的。孫應時雖位居官僚系統的末端，卻同樣秉持著時代賦與士大夫群體的強烈使命感，儘管這種使命感與其邊緣性地位之間往往有一種弔詭的尷尬。學界研究往往聚焦范仲淹式的高官名人，而孫應時式的中低層官員卻占士人官僚最大基數，對宋代官僚群體與官僚政治來說，更本質地反映了歷史的實相，無疑具有個案研究的獨特價值。

在道學完形過程中，朱熹、陸九淵等大儒歷來備受矚目，但道學之成為一時代思潮，實乃原創思想家與眾多追隨者的合力之勢所滙成。孫應時作為追隨者，不僅終身服膺道學思想，而且在地方官任上不遺餘力地弘揚道學。著者將其列為傳主，顯然是將他作為道學追隨者的典型而勦力研究的。

據此而論，孫應時雖然正史無傳，泯然眾人，卻在家族結構轉型、官僚系統運作、士人群體自覺與道學主潮滙聚等多維交集上，構成以往學界較少關注的多稜面的典型性，為理解南宋中期政治、社會與學術展現了獨特的新視角。全書顛覆性地將一個富涵典型性的小人物設為精心描繪的主角，旨在彰明小人物對大歷史的合力作用，讓這幅南宋中期政治全景圖呈現得更逼真、細緻與豐富。這一個案研究，不僅補充並修正了學界的既有觀點，也凸顯了中低層士人官員的研究，「對理解學術與政治的整體發展，有其重要性」。(頁 190)

三、人際關係的全息掃描

對傳主不同時段與不同群體的人際網絡的索隱鉤連，乃是貫穿全書的聚焦點。從社會學角度，人際網絡可以劃分不同的群體與層級，層級表現為逐次向外推延的，例如從家族網絡擴大到地域網絡；群體則可能互相交集，例如學術網絡、教育網絡與官場網絡之間。

著者首先將孫氏家族轉型置於人際網絡的視域，認為教育是這類寒微家族「締結人際關係的第一張網絡」；(頁 39) 繼而將教育網絡的掃描逐次外延與上推，強調太學作為多元開放的人才聚養所，對孫應時式的學子士人「扮演著智識與人際樞紐的角色」。(頁 185) 通過對傳主各種人際網絡的全息掃描與錯綜鉤隱而獲得的這些判斷，不僅其結論令人信服，其研究思路更足資啓迪。

著者「跳脫以大儒為中心的思想史視角」，(頁 121) 掃描了孫應時身處的學術網絡，揭明了南宋道學在最終定型期（宋孝宗淳熙朝至宋寧宗開禧朝）的全景圖像：一方面，開宗立派的大儒之間「雖有思想學說分歧、對立的一面，重要的特徵卻是透過相互交流辯論，彼此競合，兼容並蓄」，「藉以修正或充實論點」；另一方面，一般的道學追隨者也得以「有豐富的

機會向觀點不同的大儒問學請益」、「顯示士人具主動探詢知識的動力」、「門人師生之間的界限相對模糊，也因此出現多方從學的有趣現象」。(頁181) 著者認為：道學諸派正是在這種競合、挑戰、應對、自立中，由「發展初期的兼容並蓄逐漸轉向對立、門戶森嚴，且愈演愈烈」。(頁184) 這樣勾勒的道學思潮全景與剖析的道學門戶成立，較之學界成說，顯然更明晰、真切與深刻。

著者將官場網絡引入官僚系統研究，突破了學界迄今注重制度層面及其運作程序的局限。隨著取士名額的不斷擴容，宋代中低級官僚中員多闕少現象雪上加霜；能否在資序上從選人跨入京官，成為他們的仕途能否繼續上升的大坎。著者通過對孫應時官場網絡的鉤索，揭示所謂改官程序實即官員人際關係的見證，而「人際關係在薦舉中具關鍵地位」，(頁84) 為宋代官僚體制研究開示了新取徑。

四、官場網絡的動態把握

著者強調將官場網絡置於具體時局環境下進行細緻入微的動態把握。尤其當政局劇變猝然而至，官場網絡與學術網絡必然隨之激烈震盪，其成員也會從自身的處境考量與價值立場出發，抉擇各自不同的因應方式，令原先的網絡結構急遽分化與重新整合。在南宋中期史上，慶元黨禁不僅是最酷烈的政治地震，而且直接影響到道學的命運。著者全面抉發了傳主及其同僚學友在因應這場大變局時所呈現的多元面相，既真實展現了歷史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也動態呈現了官場網絡與學術網絡所受到的衝擊與動盪。由於黨禁後座力的強力衝擊，孫應時因朝中無人而四顧無助，那種在道學理想與仕途考量間的拿捏掂量，那種在維繫舊網絡與經營新人脈間的左顧右望，生動揭示了大變局下小人物的無奈與辛酸。慶元黨禁對孫應時官場網絡中的其他學友同樣是煉獄式考驗。著者從傳主身處的官場網絡與學術網絡中甄選了五位中下層官員，深入考索並評述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因應策略與遭際命運，輔以傳主與他們的互動，「從個體角度投射出慶元黨禁風暴中一般士人官僚的境遇實況，揭顯往昔側重群體研究較不能企及的面相」。(頁192)

通過對慶元黨禁中官場網絡的動態研究，著者彰顯了久為學界忽視的兩種面相。其一，這場大變局的捲入者，其「個人命運與群體關係並非傳統研究刻劃出的前後一貫、二元對立，反而是不同個人為因應政局變化，透過各自的人際網絡，採取了多元的回應對策，其情況相當複雜」，有力質疑了「道學與官僚兩個群體的對立印象深刻主導著後人對慶元黨禁的論著模式」。(頁 237) 其二，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相對業已擁有學術地位與家世背景的名儒高官，「中下層士人官員所受衝擊顯然更為強烈」，他們缺乏強大的家族後盾與豐裕的人際資源，「多方開展關係或迴避舊有淵源，以分散風險、趨吉避凶，自然是理解的」。(頁 240)

作為研究型人物傳記，《孫應時》的屬性與筆法都是史學的，卻並未忽略文學性詩歌的史料價值，附錄《孫應時生平與書文年表》裡就有數則詩歌繫年。正是借助傳主的詩歌，著者成功勾稽了孫應時與史彌遠的師生關係。然而，據筆者對文淵閣本《燭湖集》有限檢讀，仍有不少詩篇經過考索是可以繫年編入《書文年表》的；在以詩證史與借詩傳神上，也還有推進的空間。

這一空間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補充具體史實。例如，淳熙九年(1182)，孫應時在黃巖尉任上，提舉浙東常平朱熹正激烈彈劾知台州唐仲友，作為雙方屬官，傳主一方面在卷 14《江有梁》詩中對唐仲友造橋利民給出最高的評語：「民留我侯，敢與帝爭，我帝我侯，眉壽無疆」，一方面卻與朱熹一見定交，由此足見傳主對人際關係的微妙把握。再如，紹熙四年(1193)，孫應時出任制府幕職追隨丘壑入川，確是其仕途的亮點與轉折，著者也著力勾稽出傳主為消弭吳氏世襲企圖而幾近湮沒的活動事蹟。但倘能充分運用卷 15、17、19 其數量可觀的入蜀詩作，既能進一步凸顯傳主與丘壑的親密關係，也能還原其具體的行蹤，更能曲盡其舒暢的心境。

其二，鉤隱幽微心態。在慶元黨禁中，傳主某些非酬贈類詩作泄露了最隱秘的心態，其價值相對比往來書信更值得珍視。例如，黨禁方興之際，孫應時謹慎自保，另尋奧援，好不容易出知常熟縣。卷 17 有《三月八日挈家赴官常熟》與《九日偕同寮至破山還飲誓清亭》即作於此時，他感嘆事業虛空，薄宦驚心，醉醒自知，時欲賦歸，心態之矛盾複雜與苦澀迷

茫躍然紙上。卷15《元日自警》原注作于庚申，恰是黨禁厲行的慶元六年（1200），其詩自陳「天命未敢知」，卻仍自誠應不改「昭昭汝初心，敬戒以自持」，這種堅守底線的認知，也頗說明問題。緊接此詩的《自警》也作於其時，自述對黨禁的恐懼而慶幸免於難，哀歎自己猶如磨盤上隨磨而轉的螞蟻那樣渺小與無奈。這種歷史大風濤下小人物的真實心態，即便書信也從未敢袒露的，也更逼真傳神地觸摸到孫應時在彼時的溫度感。

總之，《孫應時》以一個邊緣小人物展現一段多變大歷史，抓住了社會政治的時代議題，出色完成了研究的目標，對於宋史，尤其南宋史研究具有示範價值。這種示範價值主要在於研究法門與學術路徑的啓示，並非倡導群起複製邊緣人物傳記型專著。類似傳主那樣有充裕的文集足供取資的邊緣人物，在宋代雖非絕無僅有，畢竟鳳毛麟角（當然，對邊緣人物的專論式研究仍有相當餘地）。

隨之也引出另一層感想。無論專著型還是論文式的人物傳記，都歸於個案範疇，在體式與內容上有特定限制，在史學方法上屬於枚舉例證法，個案再有典型意義，仍有其局限性。進而言之，借助個案研究引出的結論，倘能與群體研究相互印證，其普適性則更上層樓。即以中下層士人官僚群體研究而言，群體歸納法仍大有其用武之地。而群體歸納必須匯總足夠數量的樣本數據，需要對全部樣本仔細比勘，進行類型的區分，然後確定恰當的統計方法，包括動態變化的統計，這樣獲得的判斷，與《孫應時》式的典型個案引出的結論對照互證，必能更有力地修正以往的偏見，更接近歷史的實相。

